

2000 年以来国内五四运动研究热点述评

张雪萍

[摘要] 本文分别从五四与中国现代化、五四精神的再阐释、五四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五四启蒙问题、五四区域研究、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五四运动与儒学七个方面介绍了 2000 年以来国内研究五四运动的主要成果。特别是对一些新成果、新观点做了较详尽的介绍。

[关键词] 五四; 现代化; 五四精神; 启蒙; 儒学

[中图分类号] K2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08(2004)03—0073—06

80 多年来, 人们对五四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成果浩若星辰, 自 2000 年以来, 学者们对五四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呈现出了不同以往的新特点, 提出了自己对五四的新见解、新观点, 现就一些主要研究成果作一述评。

一、关于五四与中国现代化的问题

20 世纪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世纪, 本世纪的三次历史巨变(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着划时代的作用。但是处于前两次巨变之间的“五四”占有怎样的地位和作用呢? 对此学者们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马广荣认为五四运动使“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深入到最深层面——思想文化层面, 它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过程, 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这是因为五四运动解放了人们的精神思想, 并且找到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由被动到主动的指导理论, 即马克思列宁主义, 最后, 五四运动使爱国主义得到升华,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 爱国主义始终是社会动员、凝聚人心、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的旗帜, 谁抓住了爱国主义这面旗帜, 谁就占据了领导现代化的精神制高点¹。

李可亭认为五四运动既是鸦片战争后开始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逻辑环节, 同时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折”。并指出五四时期倡导的现代意识, 奠定了 20 世纪中国一切具有现代意识的现象基础, 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现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具体表现在: 一、理性精神增加: 提出了民主和科学两大口号, 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思想保证; 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二、爱国主义精神升华。三、竞争开放意识增强。四、现代学术范式建立。五、现代家庭观念产生^④。

周建超则重点论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历史地位, 认为这种地位表现在: 一、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二、提供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前提, 从而使中国人民找到了指导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新的有效的理论武器; 三、从根本上抛弃了华夏中心主义, 彻底砸烂了自我封闭的思想体系, 大大解放了思想, 从而为此后物质、制度、思想、社会诸方面的全面现代化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四)。

张荣华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五四先驱认识到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化之所以失败的关键在于“国民素质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 或者说, 中国以往的革新缺少

思想层面改造的内容, 缺少人的现代化”。因而高举人的现代化的旗帜, 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 进而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因此五四运动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的开端, 而且是由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的转折点^{1/4}。

二、对于五四精神的再阐释

五四精神具有无穷的魅力, 85 年来一直激励和鼓舞着进步的人们, 吸引着人们去讨论、研究。那么, 什么是五四精神呢?

有的认为是爱国主义, 有的认为是民主与科学, 有的认为是解放思想、不断创新, 有的认为是理性精神、个性解放, 有的认为是勇于探索、追求真理, 有的认为是破旧立新的革命或变革, 有的认为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 等等。陈敏荣认为五四精神就是“从文化上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精神”。作者指出五四志士从文化入手, 提出了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 认识到科学和民主在实现中国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 发出国民主体意识觉醒的呼唤, 第一次提出人的现代化问题。“纪念五四运动, 要强调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 更要高度重视五四的科学民主精神, 从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2}

袁庆新认为五四运动的主旋律是“强调人的价值, 宣扬人的主体性, 主张人的自由自主”。而“民主、科学、爱国都是围绕着人的觉醒和解放提出来的”。如果没有人的觉醒, 没有认识到个人的价值、人的个性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性, 是不可能产生五四这场以人的思想解放为核心的启蒙运动的^{3/4}。

温延峰认为爱国主义是五四的灵魂。这是因为五四时期, 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并产生中国共产党, 因此, 马克思主义还没有成为动员和指导中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五四从进步青年的学生运动开始, 到工人、商人、农民参加的全国性革命运动, 不仅在于他们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 而且还在于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和凝聚力, 推动人民为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而斗争。“五四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 其出发点和根本落脚点都是爱国主义”^⑧。

张静如也认为五四时代是创新的时代。“这集中体现在当时的先进分子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高度的创新精神上”。其主要表现在他们能够把创新同时代、同社会进步联系起来; 他们强调要打破旧观念、树立新观念; 他们坚信新的必然会代替旧的; 他们把创新用于改造社会。同时, 五四先进分子“在实践上进行了许多方面的创新”, 比如宣传各种新思潮, 提倡民主和科学, 树立马克思主义旗帜, 建立中国共产党等⁽¹⁾。

三、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的研究

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近几年人们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研究呈现出多角度、多层面的特点。

炎冰认为先进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主将和中坚, 并指出: 从知识分子的人格主体和文化心理层面分, 五四运动发生与他们求真求新传播文化的职业本位意识, 倡导个性追求自由的内心向往, 济世救民安邦救国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其群体队伍的扩大与成熟和“抵强御侮”“国存自强”的民族意识等紧密相关^⑩。

关于知识分子道路的选择问题, 陈瑛指出五四先进知识分子最终选择走与工农相结合, 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是与其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决定的: 首先, 他们有一定的依附性, 又有一定程度的相对独立性。他们同情劳动人民, 却又与他们有感情上的距离, 愿意帮助他们改变贫穷的状况却又感到无能为力。其次, 知识分子是以独立从事脑力劳动为主的社会阶层, 亲身参加

一线的实践活动较少,参加集体活动较少。但是他们有着深入思考认识问题,较快接受新鲜事物,目光敏锐,眼界开阔,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的优点,所以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有了新的觉醒,认识到工农相结合的重要性,并最终走上了同工农并肩战斗的唯一正确道路¹⁰。

刘雨则研究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边际性问题,指出作为过渡时代的思想先行者,“启蒙者作为在传统文化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虽然他们后来成为传统文化的坚决批判者,但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批判和选择之间,却存在着文化角色的边际性矛盾。”这种边际人格既是两个文化体系对流后的产物,又是新旧时代接触后文化的结果,因而在边际人身上不仅具有两种以上的文化期望和文化冲突,他们角色行为也常是困惑的、矛盾的、边际性的¹¹。

屠文淑从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层面分析指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先驱都经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接触到西方文化的浸染,挖掘社会病根鞭辟入里,反对封建伦理势不可挡,然而对自身文化心理沉积是封建残余缺乏自觉的审视和理性审察,“疏漏了关注和审察自我心理和思想中的旧残痕”,在他们反封建的言行中,常常会出现难以诠释的悖逆和矛盾,客观上会成为思想变革和文化变革的阻力¹²。

叶青分析了五四运动以后知识分子队伍分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救国方略的理解不同。“由于各自社会经历、政治信仰、知识结构等的差异,使他们提出了不同的救国方略,选择不同的主义,以至形成不同的政见”¹³。

赖某深认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觉醒的重要标志是:从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到认清其真面目,从孤军奋战到认识到工农群众的巨大力量,从面对眼花缭乱的社会思潮无所适从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正是有了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才有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同时,先进知识分子的新觉醒为中共的创立在组织上及思想理论上准备了条件¹⁴。

四、关于启蒙的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经历了长期、曲折的过程,从魏源、龚自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建立共和制度,但并未完成思想上的解放,五四运动所倡导的启蒙又具有怎样的特点呢?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龙潜指出五四文化启蒙的特点,一是具有补课性质;二是在帝国主义列强枪炮的逼迫下进行。因而“五四启蒙运动显得慌乱,匆忙,紧迫,饥不择食,急于求成,几年内做完几十几百年的事,忽略文化变异的渐进性”。来势凶猛的欧风美雨造成了异质文化之间的碰撞,这为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时代条件,但由于它来得过于凶猛,文化的濡化过程被省略,来得快去得也快。民智有所启发,但却没有普及理性。科学与民主两个口号的提出,使五四文化启蒙具有明显的现代化色彩,照说可以加速新文化的建设,但激烈的反传统的结果,导致了民族文化未能衔接与传承,使民主、科学流于空洞口号。这样,便注定了五四文化启蒙运动带有先天性的弱点,因此它仍然是一次未完成的文化启蒙运动¹⁵。

伍醒等认为五四启蒙嬗变的原因“是国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际上由于被先进知识分子尊为先生的英、法、美等国老是侵略中国这一事实,动摇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好感,反而苏俄社会主义文明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日益增加。国内则主要由于:一、中国政治黑暗迫使启蒙运动的领导者不得不去涉足政治,“启蒙者一个个转型,就使得启蒙运动的嬗变无可挽回”。二、五四后期,启蒙运动主体的青年学生分子参加政党,投身政治运动当中,启蒙阵营的力量遭到巨大削弱。三、“启蒙的主题个人主义被政治运动的主体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所取代”,启蒙

运动也就被政治运动所取代¹⁶。

黄华文认为五四民主启蒙未能实现主要因为:其一,民主理论与民主进程具有同步性。中国的民主进程几乎没有,当然外来的民主理论不能在中国实现。其二,启蒙代表人物自身理论水平有限,对西方各民主理论源流、流派、适应条件缺乏正确的理解和研究。因而无法形成适合中国的民主理论体系。其三,中国思想主流的改向,“使五四启蒙运动的民主理论建构失去了社会依托”,启蒙也因而告终¹⁷。

高力克在《五四的思想世界》一书中对五四民主启蒙未能实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其一,中国社会的主体是阿 Q 式的农民,而不是英国的市民,因而中国启蒙的基本困难,即在于其匮乏自由主义现代性由以生长的欧美式市民社会的土壤。其二,中国启蒙运动肇端于中西文明的冲突。这一由西方现代性激活的外源性的启蒙运动,与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之间难免具有深刻的价值断裂性。其三,中国迟到的启蒙理想,在其西方故乡早已过时。中国和西方启蒙及自由主义的这一不幸时差,使中国的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与其西方导师的当代思潮大异其趣。其四,中西启蒙的不幸时差,还导致了启蒙思潮内部之理想的冲突,其中包涵着启蒙与反启蒙、后启蒙的思想冲突。这种现代性的分裂,也是中国的启蒙和自由主义姗姗来迟又匆匆而去的重要原因。其五,中国启蒙运动源于寻求国家富强的民族主义目标,因而启蒙始终与民族主义结伴而行。当中国的国家利益遭到侵害时,中国启蒙思潮内部的民族主义激情迅速膨胀,终于压倒了自由主义因素¹⁸。

五、五四运动的区域研究

以往学者们研究五四,只重视京、沪两地,近几年学者们则把目光放到更广阔的其他地区,比较突出的是对武汉、贵州、南昌三地的研究。

田子渝的《截汉运动史》采用多维的思维方式对武汉的五四运动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一、武汉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的作用有限,仍然是一个配角的作用”。二、五四运动以后,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作者从武汉的特点出发,更重视“活动载体的研究”,指出在传统的报刊图书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武汉地区还有自己的特点,即通过人际交往,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通过交谈、信件等交往手段,去影响自己周围的人,并促使他们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¹⁹。

林建曾发现:五四在贵州历史上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由于贵州社会的特殊性,这一影响又是极其有限的,它不曾出现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六三”以后学生运动走向社会,走向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更广泛、更深入发展的新阶段。作者分析了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阻滞贵州社会经济进步发展的封建主义和与之相勾结的帝国主义的存在。贵州广大民众亟欲改变现状,而向往美好社会,因此,任何变革社会的新思潮都会在贵州激起反应,但又由于贵州经济落后,一直保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传统儒家思想保持其统治地位,而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处于初步、微弱的发展状态,长期生活在封闭式社会环境中的人们对新思潮、新观念知之甚少,破旧立新尚须时日。再加上贵州青年知识分子对五四的响应不曾与贵州当时的社会实际相结合,所谓反帝只停留在抵制日货阶段,所谓反封建,矛头也主要指向北洋政府,相反,对贵州军阀集团并不涉及,反为之所利用,结果在军阀、帝国主义的压制下,经历运动后不久即再次恢复了死水一潭²⁰。

李健对南昌的五四运动进行了研究,指出: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江西,南昌学界商界纷纷响应。“青年站在运动的最前列,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商界也投身于五四运动中,表现出应有的爱国精神”。江西督军陈光远迫于形势又顾及自身利益,对这次运动采取了同情支持和镇压相结合

的两面政策,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江西学生运动的发展²¹。

六、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

五四时期的人物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之一。以往学者们大多注重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的研究,近年来,关于这一时期其他重要人物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突出的是对梁漱溟、钱玄同、高一涵的研究。

关于梁漱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学术界,过去一般认为梁漱溟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西方文化论战,是站在陈独秀、胡适一派对立面的,是东方文化派或顽固守旧派的主将与代表人物,他的文化思想代表了保守的社会层面。对此,熊吕茂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指出:梁漱溟并不笼统地反对或赞赏西方文化,也不是笼统地反对或赞赏东方文化;并不是反对民主和科学,而是始终赞赏民主和科学;并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而是文化多元主义者;并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去反对现代化,而是顺历史潮流憧憬现代化。同时,作者还指出,梁漱溟并没有限于中西文化孰优孰劣之争,而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以一种文化多元论的眼光来处理西、中、印文化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找拯救人类文明的良方²²。

刘贵福论述了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关于思想革命的主张,并对其思想革命的特点及产生这些特点的社会思想原因进行了分析。钱玄同在五四运动中成为激进的反传统者,反对封建纲常礼教,甚至主张提倡“废汉文”。“钱玄同此时的思想重点是向西方学习,而并非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去创造新文化”。他的这种激进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形势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其自身的原因,因为他的思想中有无政府主义、进化论思想、经学思想的影响,其思想性格也是导致其激进的原因²³。

张春丽对高一涵的人权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究,指出,作为《新青年》阵营中陈独秀的重要助手,高一涵也竭尽所能宣传西方的人权说,他所诠释的人权更多的是指“国民素质的自由和解放,这也把握了民主思想的真谛”。因此,高一涵对民主的宣传已经“跨越了具体的政治建制层面,转向对民主政治内在精神的探讨,具有更为宽广更为深邃的思想启蒙意义”²⁴。

七、五四运动与儒学

孙玉石的文章《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孔思潮之评议——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说明了启蒙先驱们不得已而为之的历史选择,不得不谈“学说”而重“时事”的苦衷,也指出了这股思潮背后的问题所在:一、是启蒙者们构筑了一个关于孔子和儒学传统学说的整体观,这样即使有一些肯定孔子和孔教的说法,也难以改变其全面非孔的形象,他们的激进主义就是包含在他们为孔教构筑的“系统”中;另外,则是他们过分漠视新旧思潮争论中温和论的调和作用,拒绝了对于新旧之间某种联系和对话可能性的思考,也就失去了对孔子和儒学传统激进主义的批判中的冷静分析²⁵。

欧阳哲生从分析儒家的渊源流变入手,区别了儒家、儒学、儒教三个概念。从政治文化、伦理、学术三个层面探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健将与儒学、儒家、儒教之间的关系,新文化运动对儒家伦理的排拒,对“礼教”的批判,有其合理的一面,“在于否定了儒家的等级伦理观念”;也有其缺失的一面,其主要缺失是“对儒家伦理蕴涵的超时代性、超阶级性的合理内核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分析”²⁶。

刘玉凯在《“传统”与“断裂”的困惑——关于“五四与传统文化”的讨论》一文中指出,五四反传统并不是“全盘否定”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反对的是封建意义上的传统,即传统中的封建因素,而非整个传统文化”。五四先驱者们表面上全盘反传统,实质上反的是传统中维护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的那些最腐朽的东西,重点是三纲及由此衍生的贞洁观念及奴隶道德²⁷。

陈祖怀认为新文化运动对孔教的猛烈抨击,“直接埋下了对中国社会的巨大伤害和伦理道德急剧沦丧的文化种子,并长久成为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沉重内伤”,这主要是因为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对儒学本真意义上的主旨研究不足,对儒家源流演变深层原因分析不够,对儒学中包含的积极性研究不足²⁸。

注释:

¹ 马广荣:《五四运动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甌建研究》,2000 年第 5 期。

④李可亭:《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化进程》,《鄞丘师专学报》,2002 年第 2 期。

(四)周建超:《“五四”启蒙与文化现代化》,《江苏社会科学》,2001 年第 6 期。

^{1/4} 张荣华:《“五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山东青年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1 年第 3 期。

^{1/2} 陈敏荣:《对五四精神的重新审视》,《理论月刊》,2002 年第 5 期。

^{3/4} 袁庆新:《“五四”精神与现代化》,《自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 年第 2 期。

⑧温延峰:《爱国主义是五四运动的灵魂》,《理论观察》,2000 年第 3 期。

(七)张静如:《五四时代是创新的时代》,《中共党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⑩炎冰:《知识分子与五四运动》,《扬州大学学报》,2001 年第 5 期。

10 陈瑛:《五四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高校理论战线》,2000 年第 5 期。

11 刘雨:《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角色体验》,《天津大学学报》,2002 年第 9 期。

12 屠文淑:《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先驱的文化心理探赜》,《江西社会科学》,2000 年第 11 期。

13 叶青:《五四以后知识分子队伍分化与嬗变原因再探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0 年第 2 期。

14 赖家深:《“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新觉醒》,《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0 年第 4 期。

15 龙潜:《历史的脚步与背景——五四文化启蒙运动的文化思考》,《贵州社会科学》,2002 年第 3 期。

16 伍醒:《五四启蒙嬗变的原因》,《江西社科》,2003 年第 2 期。

17 黄华文:《对五四民主启蒙运动的审视》,《理论学刊》,2001 年第 1 期。

18 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学林出版社,2003-11-11。

19 唐宝林:《五四运动研究中的一枝奇葩——评《秦汉五四运动史》》,《江汉论坛》,2000 年第 2 期。

20 林建曾:《试析五四前后的贵州社会变革思潮》,《贵州文史丛刊》,2002 年第 1 期。

21 李健:《论南昌的五四运动》,《江西社会科学》,2000 年第 1 期。

22 熊吕茂:《梁漱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2 年第 2 期。

23 刘贵福:《钱玄同与五四思想革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0 年第 5 期。

24 张春丽:《试析高一涵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人权思想》,《承德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 年第 4 期。

25 刘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非儒反孔思潮研究回眸》,《文史哲》,2003 年第 2 期。

26 欧阳哲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关系为中心》,《中国文化研究》,2001 年第 2 期。

27 刘玉凯:《“传统”与“断裂”的困惑——关于“五四与传统文化”的讨论》,《河北大学学报》,2002 年第 1 期。

28 陈祖怀:《新文化运动儒学批判的三点反思》,《史林》,2000 年第 2 期。

(本文作者 北京师范大学法政所 2003 级硕士研究生 北京 100875)